

陈子展文存

复旦中文先哲丛书



下编

专著选编

中国文学史讲话

中国文学史讲话总目

上 卷	591
第一讲 从诗人时代到哲人时代	591
第二讲 楚辞与汉赋	626
第三讲 乐府与诗	651
第四讲 第二诗人时代	710
中 卷	787
第五讲 诗人与词人	787
第六讲 杂剧	867
下 卷	912
第七讲 传奇与章回小说	912
第八讲 从旧文学到新文学	1025

中国文学史讲话上卷目次

第一讲	从诗人时代到哲人时代	591
一	从三百篇说起	591
二	三百篇与孔子	594
三	三百篇析论	606
四	诸子文学	617
第二讲	楚辞与汉赋	626
一	楚辞溯源	626
二	楚辞篇目及其作者	631
三	汉赋继楚辞而起	635
四	汉之赋家	638
五	赋与散文	645
第三讲	乐府与诗	651
一	汉代乐府与五言诗	651
二	魏晋诗人与乐府	661
三	南北朝诗人与乐府(上)	672
四	南北朝诗人与乐府(下)	694

五	文笔之辨	703
第四讲	第二诗人时代	710
一	第二诗人时代鸟瞰——唐诗鸟瞰	710
二	初唐诗人	715
三	李白杜甫及其同时诗人	723
四	韩白及其同时诗人	743
五	晚唐诗人	762
六	古文运动(附论唐人小说)	776

第一讲 从诗人时代到哲人时代

一 从三百篇说起

要写这样一部篇幅不在贪多的文学史,究竟从哪里说起才好呢?我想只有从《三百篇》说起。写一部极详的文学史,就不妨从文字的创造,文学的起源说起。写一部极简的文学史,就不妨从集部之首的《楚辞》,词赋之宗的屈、宋说起。还有写白话文学史的,就从古文死的时候说起,那也是不妨的。至于那些从开天辟地说起的,说什么邃古文学、唐虞文学、夏商文学,就有点靠不住了。比如他们以为真有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邱》那样的书,就说这是邃古文学,自然要承认《尚书》里的《尧典》《舜典》《禹贡》《汤誓》《盘庚》等等是唐虞、夏商文学了。其实,我们只须根据最近考古学者研究甲骨文字的结果,知道中国的历史较有把握的起头应该是商代,就会知道他们所根据的这种史实都是不可靠的。

自从一八九八年以来,河南彰德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陆续发掘了不少的甲骨文字,经过罗振玉、王国维诸家的考证,才知道小屯地方即是“洹水南之殷墟”。这种文字则为殷代卜辞。卜辞上所记贞卜事类有卜祭、卜田渔、卜年、卜出入、卜风雨、卜征伐等等,可见当时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须取决于卜的。这种卜辞都简单拙劣得很,便是它的排列也极凌乱,或横

行或直行，横行又或左读右读，并不一致。原来这种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纯粹象形的图画，不脱原始的形式。它的写法，繁简、分合、顺逆、反正、上下、左右，全无一定。而且一个字的写法也有多种，并无定型。例如一个羊字就有四十五种之多。可见商代还在文字创造的途中。这个时候，文学虽然早已萌芽，怕还做不出《尚书》里那样渐臻圆熟的文字来罢。

就是从来大家相信是真的《盘庚》，我看也不是如《史记》里所说作于盘庚之弟小辛的时候。最早怕也是殷周之际，殷之遗老或长者思盘庚之政而作。记得《吕氏春秋》两记武王找殷之遗老或长者问话，他们都有故国之思，且有“欲复盘庚之政”的话。至于相传更古的《尧典》《禹贡》，怕还是要有了战国时人的思想知识才作得出来的东西，那更是显然的事了。

或者有人要说《易经》一书也是卜辞，成书也最古，相传它是“世历三古，人经三圣”的。又因为它是卜筮之书，幸而不曾遭到秦火，真伪不成什么问题，那末，比较《尚书》总算是可靠的古书了。我则以为这部书的作者及其时代还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就算十分信而好古，姑且承认伏羲时为上古，周文王时为中古，孔子时为下古，而以伏羲、文王、孔子为三圣；还姑且承认画卦的确是伏羲，重卦的确是文王，而孔子又确曾赞《易》作《十翼》，还有卦辞爻辞又是何人所作？马融、陆绩等说卦辞文王，爻辞周公，又有什么根据？近儒皮锡瑞则以为文王重六十四卦见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而不云作卦辞；《鲁周公世家》亦无作爻辞事；他就判定卦爻辞亦为孔子所作，他的根据又在哪里？《易·系辞下》云：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

《易》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

这果然是孔子的话，那末，孔子生在周之末世，真是去古未远，何以他也不能断定《易经》的作者及其时代，只能说此悬揣的话呢？我以为《易经》里面除了所谓孔子所作的《十翼》以外，卦辞爻辞亦往往用韵。句子又极简

单,三字四字成句的最多。可以推测这个时候,使用文字的技术比较殷墟卜辞进步,约与《诗经》的年代相当。因此,我们也不妨假定《易经》作于殷周之际,它和《诗三百篇》中最早的时代差不多。西方学者有一切艺术皆起于宗教祭坛之说,近人刘师培亦云中国文学出于巫祝之官。他说:

《说文》祠字下云:“多文词也。”盖祠从司声,兼从文词之词得义。古代祠祀之官惟祝及巫。《说文》祝字下云:“祭主赞词者,从示,从儿口。一曰从兑省,《易》曰兑为口为巫。”巫字下云:“巫,祝也。又曰𠩺,古文巫如此。”案古文巫字盖从两口,即《周易》兑为口为巫之义。……盖古代文词恒施于祈祀,故巫祝之职,文词特工。今即《周礼》祝官职掌考之,若六祝六词之属,文章各体,多出于斯。又颂以成功告神明,铭以功烈扬先祖,亦与祠祀相联。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,综其大要,恒由祀礼而生。欲考文章流别者,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?

可惜刘师培不曾谈到《易经》与巫祝的关系,而定《易经》为中国最古的一部文学书,使他自己的主张更为充实有力。我看《易经》是上古巫祝所掌的卜筮之书,那是毫无疑义的事。最初文学的创造,就是由于巫祝用作神秘的符号或记录而起始的。即如八卦说是发生在文字之先,它就不能算作文字,只能算是一种神秘的符号或记录。再如相传仓颉造字,有“天雨粟,鬼夜哭”的神话,可知文字创造之初,原是被视为神秘的一种东西。我想当时文字的使用传授,以及图籍的典守保存,都是僧侣一般的巫祝和史官的特权。至今在中国称为西南蛮夷的猺獞民族,他们的文字和教育还是掌握于巫觋之手。最近广州中山大学派人前往云南调查猺獞民族的风俗,要学猺獞的语言文字,还是不得不找猺獞的“巫师”、“觋爸”请教他们的经典。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学的起源,不,文字的起源,须得考察巫祝与文字或文学的关系,须得研究殷墟卜辞,须得承认《易经》的年代虽较殷墟

卜辞为晚,却也是上古巫祝卜筮所用的书,这是巫祝文学。

《易经》固然是巫祝文学,我还疑《诗经》——至少关于宗庙祭祀的部分——也和巫祝有关。不过《易经》是占繇卜辞,多含着神秘性的思想;《诗经》是乐歌舞曲,可视为纯文学的诗歌。我的这部文学史颇置重于纯文学之发展的叙述,因此对于《诗经》特加重视,首先就要从它说起了。

我以为我们要考索文学的历史上的发展,应该以纯文学的发展为中心。纯文学之中最先发生的是诗。或云“歌咏所兴,自生民始”,或云“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开始之处”,这都是说得对的。无论哪一国的文学史,诗总是首先发生的,其次才有戏曲小说,以及其他种种,这是早已成了定论的。我国最古的诗歌只有一部《诗经》可靠。这是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,实则也就是最古的一部文学书。我不是说《诗经》以前没有诗歌,不过没有留传下来,我们就无从知道。明人冯惟讷撰集《古诗纪》,前集十卷为《诗经》以前古逸诗篇,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伪托,没有一篇是可靠的。就是前人认为可以相信的,如《尚书·皋陶谟》里的《虞帝歌》,《礼记·郊特牲》里的伊耆氏《蜡辞》,《庄子·天运篇》里的《有焱氏颂》,《荀子·大略篇》里的汤之《桑林祷辞》,以及《史记》所载箕子的《麦秀歌》,夷齐的《采薇歌》等等,也都靠不住。其他录自别书的,或是书的作者伪托,或者书的时代较后,那就更不好相信是真了。因此我讲这部《中国文学史》就只好从《诗三百篇》说起。

二 三百篇与孔子

孔子是和《三百篇》有大关系的人。《三百篇》从来被认为孔门《六艺》之一,或《六经》之一。实则它的被称为经,是孔子以后的事。孔子止称“《诗》三百”,或者单称为《诗》,和他称《易经》为《易》,称《书经》为《书》一样。《六经》之名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篇》和《礼记·经解篇》,虽

皆托为孔子之言,未必可信。《诗》既被称在内,《三百篇》就从此叫作《诗经》了。

所谓《诗经》,一般人大都说是经过孔子删定了的。主张这说最早的是司马迁,他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里说三百五篇是经过孔子从古诗三千余篇中去其重复,取其可施于礼义而定下来的。而且孔子把它弦歌起来,以求合于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我想他这些话是根据于《论语》的。《论语》上载孔子的话说:

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(《为政》)

思无邪,就可施于礼义了,司马迁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,我想。《论语》上又说:

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(《子罕》)

孔子把《诗》合乐之说就不为无根了。原来孔子还是极其懂得音乐的,《论语》上记载他说乐的话很不少呢。只有删《诗》之说,孔子自己未曾明白说过,所以弄得后来儒者聚讼纷纭,纠缠不已。清儒魏源的《诗古微》里,说夫子有正乐之功,无删《诗》之事。删《诗》之说,自周秦诸子,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《诗说》,皆未尝及;惟司马迁因夫子删《书》而并为删《诗》之说。他这些话是不错的。

我想孔子虽然不曾删《诗》,但是他却极其欢喜说《诗》的。他固然也还欢喜说到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,尤其是《乐》,然而还是不及说《诗》。据《论语》一书所载,孔子说到《诗》的有十八次之多。现在只取其最重要的来说。《论语》上载:

陈亢问于伯鱼曰:“子亦有异闻乎?”对曰:“未也。尝独立,鲤趋

而过庭，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……”（《季氏》）

可见孔子是以为人必学《诗》的，而学《诗》又是为著言语上应用的。《论语》上又载：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’，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！”（《学而》）

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”（《八佾》）

这里孔子极为称许子贡、子夏，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很玄妙的断章取义把《诗》用到言语上的缘故。本来说话引《诗》，赋《诗》言志，这是春秋时候最流行的一种风气。我们只要读了《左传》，就可以看见关于这种记载是很多的。清儒朱彝尊考出《左传》引《诗》二百九十九条，其间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四十八条，列国公卿引《诗》百有一条，列国宴享歌《诗》赠答七十条。二百零几条都是出自《诗经》，其余十多条算是“逸诗”。可见这个时候是怎样拿《诗》来应用的了。《论语》上还载着孔子对门人说过这样的话：

小子，何莫学夫《诗》！《诗》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。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。（《阳货》）

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；虽多，亦奚以为？（《子路》）

他说的兴、观、群、怨,是把《诗》用到修养性情。他说的事父事君,是把《诗》用到实践伦理。他说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,是把《诗》用到博闻强识。他说诵《诗》三百,能够授之以政,能够使于四方,是把《诗》用到政治和外交。只因那个时候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,纸笔印刷也还没有发明,书籍的钞写传播都极不容易。《三百篇》是韵语,是乐歌,比较最便于流传,它就成了当时人智识的宝库,它的应用之广就可知了。总之,孔子对于《诗》的观念,只是一个实际应用的观念。他于《诗》是有深嗜笃好的。我以为这就是孔子《诗》教之说所由来,同时也就是删《诗》之说所由来罢。

孔子既曾说过《诗》的种种应用了。晚出的《礼记·经解篇》里又载着孔子这样的话:

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;疏通知远,《书》教也;广博易良,《乐》教也;洁净精微,《易》教也;恭俭庄敬,《礼》教也;属辞比事,《春秋》教也。

孔子删定或制作《六经》以教后世之说盖出于此,《诗》教二字亦始见于此。加以和孔子并称的孟子也最欢喜说《诗》。清儒陈澧《东塾读书记》考出《孟子》一书,引《诗》者三十,论《诗》者四。因为孟老先生激劝当时梁惠王、齐宣王那些霸者而行王者之道要用《诗》云,痛辟当时杨、墨、陈相那些邪说异端而倡圣人之道也要用《诗》云。他既以为《诗》和所谓王道圣道有关系,所以又说:

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,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

他这种话就成了《诗》教的基本理论。后来删《诗》之说根据于此,采诗之说也根据于此。删《诗》之说已约略说过了,现在略论采诗。《礼记·王

制》上说：

天子五年一巡守……覲诸侯……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说：

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孔子纯取周诗，上采殷，下取鲁，凡三百五篇。

这里似乎把采诗删《诗》说在一道，班固比司马迁又多晓得一层了。又《食货志》里说：

孟春之月，群居者将散，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，献之大师。比其音律，以闻于天子。

汉人的采诗之说，理论上的根据自然离不了孟子的《诗》与王道之说。关于史实上的根据我以为就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有关。《左传》上（襄公十四年）引《夏书》说：

道人以木铎徇于路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。

这里引来的《夏书》，怕和说楚史倚相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邱》一样，都是左氏浮夸之过。杜预在这里下的注脚说：“求歌谣之言也。”显然受了汉人的采诗之说的影响。可是我们只要证以汉人所传的《周礼》天官小宰，“正岁……徇以木铎，曰，不用法者，国有常刑”之文，似乎木铎徇路的作用就不是求歌谣了。再，《国语·周语》里说：

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，史献书，师箴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。

这段话是邵公谏阻当时的独夫民贼——厉王压迫言论自由的。借古代来说，这也是主文而谏的意思。献诗之说，自是渺茫的史实。然而汉人采诗之说就更造得像煞有介事了。

跟着《诗》教而来的问题，不仅删《诗》采诗，还有四始、正变、美刺、贞淫诸说也成问题。四始之说，亦起于汉人。《孔子世家》里说：

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

据说这是司马迁由《鲁诗》引来的。《鲁诗》亡于西晋，其详不可得而闻了。又《毛诗大序》说：
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《风》之始也。《风》，风也，教也；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《雅》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《颂》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，《诗》之至也。

这似乎是说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就是四始，不是以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第一篇为四始，和《鲁诗》又不同了。此外，《齐诗》一说，《韩诗》一说。只因《齐诗》好言讖纬，随讖纬之亡而亡了，《韩诗》又亡于北宋，所以这两说不占势力。皮锡瑞的《诗经通论》想替四始之说结一总账，说是当从司马迁所引《鲁诗》，这是定论，必不可不遵；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文王》、《清庙》皆歌文王之德；为后世法，也是定论，必不可不遵。其实，“何书不有发端？

体例奚关大义？”魏源这两句话真说的不错，他的《诗古微》里《四始义例篇》都可以不作了。

还有正变美刺之说也出自《毛诗大序》。《大序》里说：

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……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
这篇《大序》畅论《诗》教，——畅论《诗》与王道的关系。他以为治世的诗安乐，乱世亡国的诗怨怒哀思。那末，变风、变雅正是后一类的诗，前一类的诗就是正风、正雅了。以《二南》为正风，争论还少，因为孔子曾对他的儿子伯鱼说过这样的话：

女谓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？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

其他何者为正，何者为变，就难说了。又《诗序》每于认为治世的诗就说这是美什么的，认为乱世的诗就说这是刺什么的。纵《诗》有美刺，难道治世就没有什么可刺的，乱世就没有什么可美的？拿治乱定美刺，拿美刺定正变，这是说不通的。然而自《诗序》以后，正变美刺之说，异论纷拏，不可爬梳。宋儒郑樵、朱熹都疑孔子未尝言，经无明文可考。直到清儒崔述的《读风偶识》，就根本要推翻正变之说了。

至于贞淫之说，更是一个麻烦透了的问题，原来最初孔子论《诗》就曾触及过的。《论语》上明明记着孔子这样的话：

《关雎》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（《八佾》）

恶紫之夺朱也，恶郑声之乱雅乐也，恶利口之覆邦家者。（《阳货》）

颜渊问为邦。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。放郑声，远佞人；郑声淫，佞人殆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

《礼记·乐记》篇也有郑卫之音、乱世之音；桑间濮上之音、亡国之音的话。如果所谓郑声、所谓郑卫之音，真是《郑风》、《卫风》，那末，《三百篇》中就不少淫声了。孔子说过“《诗》三百，思无邪”的话，就须别求解释。比如《诗序》把许多涉及男女私情的诗指为刺某人刺某事，否则无可曲解就指为刺奔，怕就是这个缘故。又如朱熹作《诗经集传》，不相信《诗序》，指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序其事的凡二十四篇。他不讳言淫诗，以为“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”。又以为“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，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”。到了他的三传弟子王柏作《诗疑》，比他的学说更进一步，主张应删淫奔之诗，就很大胆的说：

妄意以刺淫乱如《新台》、《墙有茨》之类凡十篇，犹可以存之惩创人之逸志。若男女自相悦之词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之类，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，无可疑者。……若淫奔之诗，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，虽閭閻小夫亦莫不丑之。……今夫童子淳质未漓，情欲未开，或于诵习讲说之中，反有以导其邪思，非所以为训。且学者吟哦其丑恶于唇齿间，尤非雅尚。读书而不读淫诗，未为缺典。

他主张应删的淫奔之诗有三十二篇。（今案原文所记篇目，实止三十一篇）。我把它拿来连同朱熹认为男女淫佚奔诱的诗二十四篇和《诗序》所说的作一对照表如下：